

1506

淮坊文史資料選輯

第二輯



目 录

我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的前前后后·····	黄秀珍 (1)
对太河惨案的回忆·····	马 若 (13)
“抗日堡垒”长秋村·····	陈万增 (35)
回忆陈毅担架连·····	马洋祥 侯爱华 (44)
潍县中国同盟会·····	陈慕虹 (58)
高密县第一个同盟会员刘冠三·····	于天助 (72)
忆先祖父刘冠三·····	刘明禅 (82)
青年时代的孟超·····	管士先 (86)
一个进步知识分子的战斗历程——革命烈士	
“五·四”时期的进步诗人臧亦莲·····	王克迅 (98)
潍坊华丰机器厂创始人滕虎忱·····	市工商联 (110)
山东省立第四师范学校纪略·····	沈建令 丁广生 (122)
创办省立十三中学的回忆·····	刘少青 (139)
青岛山东大学学生运动回忆片断·····	钟剑秉 (153)
潍县傅戈庄火焚盐店案始末·····	于沅伯供稿 (172)
杜 宇整理	
高密县孙文抗德阻路斗争补记·····	刘树塘 (184)
东北军占潍县·····	裴灵椿 (214)
蒋冯阎中原大战殃及潍县·····	韩愉庭 (219)
宋伯良	
张景月与张天佐的勾结与矛盾·····	夏绥万 (238)

潍县图书业概况·····	张冠群 (244)
潍县信丰染印公司今昔·····	市工商联 (256)
陈介祺与毛公鼎·····	高默之 (277)
公立义田碑·····	郭子宣 (280)
潍城现存碑刻·····	李会林 (284)
潍城的庙宇·····	李子琇供稿 (290)
	郭子宣补充整理
我当和尚二十年·····	杨志明 (307)
潍城掌故二则·····	高默之 (312)

我在莫斯科中山大学 学习的前前后后

黄秀珍

1925年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我有幸被党组织派到莫斯科中山大学去学习。那时，一群为寻求救国真理而来到友好邻邦的青年学生，思想纯朴，热情奔放，对周围的一切感到是那样的新鲜。如今六十年过去，世事已发生了沧桑之变，然而追忆往昔，一幕幕往事仍如在眼前，令人不胜感慨。

1924年我在济南女子师范学校临毕业的时候，由共青团员转为共产党员，那时正值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次年春孙中山先生逝世；国民党筹备召开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党组织与国民党达成协议，决定我作为山东妇女代表去出席这次大会。那时北洋军阀张宗昌督鲁，残酷镇压革命群众，我父亲王翔千由济南去青州我叔处暂避，我也提前到了上海，等候去广州开会。在沪期间，跟

随向警予同志到上海郊外各工人区做女工工作，还在共青团中央和上海市委工作过一段，所以有幸见到过任弼时，恽代英、张秋仁、贺昌等革命前辈和先烈。当时，关向应、瞿景白也在上海团市委工作，我亲眼看见关向应被派往山东工作。

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一再延期，党组织又决定要我去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出于对伟大十月革命故乡的无限景仰，当时那种高兴的心情简直无法形容。我与王茂坚、王桂林、王仲裕、王哲、刘子班、夏云沛、庄东晓等十多名山东学员在上海汇合（其中女的只有我和庄东晓二人）。十一月初，我们秘密登上一艘苏联货轮，记得在船上过了十月革命节，经过一周多的风浪颠簸，到达了海参崴。同去的约一百余人，有蔡和森夫妇、李立三夫妇，他们是去参加国际会议的；学员中有茅盾的弟弟沈泽民夫妇、王稼祥和傅学文等。住了几天后，便搭上了开往莫斯科的火车。十月革命以后不久的苏联，当时经济困难，物质条件较差，社会秩序也不太好，火车是烧木柴的，速度很慢。时值初冬，大雪纷飞，车上没有暖气，我们中国学生坐的那节车，日夜有人轮流值班站岗。尽管旅途生活是艰苦的，但大家都满腔热情，并不觉怎么苦，火车走了半个

月才到达莫斯科。

莫斯科中山大学座落在莫斯科河西岸的沃尔洪卡大街上，是一座规模较大的四层楼房，与皇家大教堂只有一路之隔，这里是世界闻名的大教堂之一，是俄国皇帝举行加冕典礼的地方。克里姆林宫与学校隔河相望，入夜，宫内钟楼塔尖上的巨大红星熠熠闪光。这所大学，是在孙中山先生逝世后，苏联为纪念孙中山和为中国培养革命干部而创建的，它比专门接受共产党员的东方大学物质条件和生活待遇要优越得多，是苏联人民热情支援中国革命的无私表现。

我入校时，在校学生有三百人左右，后来发展到五百多人。我们去的这一批是第二期。学生中有共产党员，有国民党员，也有进步青年。他们中有张闻天、刘伯坚、左权、朱瑞、屈武、李培之等。一些国民党的要人也把自己的子女、亲朋和秘书送来学习。如蒋介石的儿子蒋经国，于右任的女儿于楞，冯玉祥的儿子冯洪国、女儿冯弗能，邵力子的儿子邵志刚，还有汪精卫的亲戚陈春圃等。黄埔同学会的青年军人李秉中、康泽、邓文仪等也来到这里。后来一些留法勤工俭学的学生，如傅钟、邓小平、任卓宣等也从法国前来。1926年暑假过后，我和邓小平编在一个

班里，那时他二十刚出头，性情爽朗，爱说爱笑，富有组织才能，给同学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不过没过多久，大概在阳历年前后，他和肖鸣、李宪仲等几个同学就被派到冯玉祥那里去工作了。任卓宣后来叛党，改名为叶青，成了国民党的反共专家。

学校的校长拉狄克，是一个老布尔什维克。副校长米佛，是一个十月革命后某学校毕业的青年，由于他对研究中国革命很下功夫，后来在第三国际东方部专搞中国革命运动。就是他把王明一伙扶上了领导岗位，在党中央掌权四年之久，推行左倾冒险主义路线，使中国革命蒙受了重大损失，我工农红军被迫进行了二万五千里长征。中山大学的教师中，有老布尔什维克，也有红色教授学院毕业的学生，还有一些外国的革命领袖，在国内不能存身，暂时居留苏联，也来为中国革命培养人才。给我印象较深的是西方史教员瓦克思，他是老联共（布）党员，虽已经六七十岁，背也驼了，但精力充沛，刻苦好学。他已会九国文字，还认真学习中文，有机会就让中国同志教他，过了一年多的时间，竟然能听懂翻译替他翻译的功课。我一次亲见他用英语讲西方史课，沈泽民给他当翻译；有一句话译意不确，他当即察觉并进行了纠正。

我们的学习生活是紧张而愉快的。学习的课程有政治经济学、列宁主义(即联共(布)党史)、东方革命史(主要是印度)、西方革命史、中国问题,还有俄文、军事学和苏维埃建设等,共有十多门课程。苏维埃建设这门课主要是现场参观,我们参观了许多地方,有工厂,有监狱,有大型水电站(如当时正在建设中的沃尔豪夫水电站)。寒假期间,我们还专程去列宁格勒,参观了沙皇的冬宫和发出十月革命第一声炮响的阿芙乐尔号巡洋舰;还看了涅瓦河中的一个海岛,上有沙皇囚禁革命者的一座堡垒式建筑物。有一次参观了沙皇的夏宫,在四周那些栏杆上,导游指给我们看,说上面雕刻的小狗图案颇像沙皇尼古拉二世的模样,看来是工匠们精心设计和安排的。

学校里设有俱乐部,每周都演出节目,节假日更不用说,有时是和东方大学联合举办,两校学生同台演出。所有节目都富有思想性,看后使人很受教育。比如曾放映过一部纪念十二月党人起义、沙皇亚历山大一世被刺的电影,这个电影反映了资产阶级的动摇招致了革命的失败。聚集在广场上的广大群众向发起政变的军官们鼓劲,而那些军官反倒犹豫不决起来,结果招致失败。

军官的首领雷列耶夫，失败后被囚在涅瓦河的小岛上，他新婚的妻子买通看守的士兵，夜间去给他送东西，岂不知可恶的沙皇在这之前已经把他杀害了。

记得有一次晚会，是在教务处的小礼堂召开的，台上宣布由校长拉狄克讲课，果然上了一个同拉狄克一模一样的人，他先讲了一段课，然后就开起玩笑来。他说，我们的学生有百分之几十是男的，百分之几十是女的……（可惜以下说的都忘记了），大家不由得奇怪起来。这时讲话人亮了相，原来是蒋经国这个小淘气在演出节目呢！对这个小同学的滑稽而有趣的表演，大家都报之以热烈的掌声。

苏联有关方面为我们的学习提供了良好的条件。1926年暑假时，学校除把几个有病的学生送到南俄黑海之滨去疗养以外，其余学生全部安排到莫斯科郊外的一个休养所去避暑。这是旧俄时代的一所别墅，似与普希金有什么瓜葛。别墅座落在一个大森林中，一座座木头建筑的小洋房，式样别致，装潢精美，有阳台和壁炉，附近还有潺潺的溪流，广阔的草地。夏季的莫斯科市郊，气候宜人，芳草如茵，鲜花盛开。置身于这优美的自然环境中，简直令人心旷神怡，情不自

抑。一天到晚，大家或散步，或跳舞，或打球，或游泳，尽情地欢娱。活动累了就坐下来读报，唱唱歌。有时还和在这里休养的工人和附近农庄的青年举行球赛，俱乐部里天天有文艺节目和电影。偶尔也到附近集体农庄去参观。有一次参观一个农庄时，一个叫王长熙的同学惹恼了蜜蜂，群起攻来，大家急忙退避，后来画到了墙报上，大家见了都不觉好笑。休养所的生活也安排得相当好，每日四餐，牛奶、咖啡、鸡蛋、方糖基本上满足供应，午晚两顿正餐还有鱼肉。经过两个月的休养，同学们的体重普遍增加了，体质增强了。记得休养期间，学生党支部进行了改组整顿，把少数不安心学习和反共的学生送回国内。学校还重新调整了班次，我和湖北女生杜林分在二年级第七班，同班的还有傅钟、左权等，直到1927年夏季毕业。

在中大学习期间，我们参加了苏联一些重大政治活动。如十月革命节、“五一”劳动节，我们全体学生都参加了在红场上举行的盛大群众游行。在联共（布）十四次、十五次代表大会和第三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期间，我们中大也派出学生代表，以来宾身份列席了这些大会。中国革命的节节胜利，特别是上海工人第三次起义的胜利，引起了

莫斯科群众的倾城狂欢，直到深夜。晚上，许多机关团体邀请我们中国同志去参加了他们的庆祝会。“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发生后，友好的苏联人民和我们一起举行了示威游行，愤怒声讨蒋介石大肆屠杀共产党人的暴行。这时联共（布）党和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反党联盟的斗争正处于白热化的时刻，在广大苏联人民的支持下，托派反党份子原形毕露，他们的谬论失去了市场。尽管中大校长拉狄克成了托派，把斗争带到学校中来，利用讲课的机会攻击党和共产国际的路线；但是我们绝大多数的中国学生始终坚定地站在联共（布）党的一边，并未因托派的反动言论而动摇。

在我们即将毕业回国的前夕，苏联人民的伟大领袖斯大林同志曾亲临学校给同学们作了报告。记得他在报告中主要讲了中国革命的性质和任务。当时托洛茨基曾散布中国已经资产阶级化了，中国革命应是无产阶级革命的论调，斯大林有力地批驳了这种论调。他讲的大体意思是，中国是半封建半殖民地国家，革命的对象主要是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至于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力量还很薄弱，他们固然有剥削人民的一面，但也有受帝国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压榨的一面，所以他们有两重性，既有革命的要

求，又害怕革命，表现出软弱性和动摇性，不能把他们当成革命的主要力量，但把他们当作革命的对象则是错误的。中国革命应先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然后才是社会主义革命。斯大林的讲话雄辩有力，深刻生动，听后心胸豁达，茅塞顿开，使我们对中国革命的性质和任务有了更深刻的理解。国际妇女运动著名领袖蔡特金也曾给我们讲过话，她已七旬高龄，纵论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妇女争取自由解放的问题，也使我们深受教益。

1927年6月初，我们学业告成，启程回国。当时，蒋介石背叛革命，国共两党分裂，张作霖等北洋军阀还统治着中国的北方。在这种不利的政治形势下，我们怀着沉重的心情踏上了归途。因为正常的交通渠道被阻断，只好绕道经过西北军将领冯玉祥的辖地，目标是先抵武汉。我们第一批回国学生沿着西伯利亚大铁路，乘火车到达贝加尔湖畔的乌兰乌德，越过和蒙古人民共和国交界的恰克图和买卖城，然后同后两批学生在乌兰巴托会齐，由马骏同志带领，我们急匆匆地准备了一些应用物品，雇了两辆汽车，沿着大沙漠中一条人迹罕至的偏僻小道出发了，坐了一段汽车，又骑了八天骆驼，来到沙漠南边沿的一个

叫“夏拉寨”的地方，那里有中国商贩设的两个蒙古包。从这里又换了骆驼，绕着贺兰山走了四天，到达宁夏银川宋哲元的司令部。宋哲元是冯玉祥的部下，对待我们不错，吃住都在他的司令部里，他一再告诉我说：你们放心，我一定负责把你们送交总司令（指冯而言），但你们不要自由行动，以免引起不便。过了几天，冯玉祥来了指示，我们又乘车离开宁夏，向西安前进。

在西安，我们见到了冯玉祥，他招待我们吃了一顿饭，并对我们说：武汉叫把你们送去，南京方面也叫把你们送去，我真不知道怎样才好。当时，宁汉合流，冯玉祥倒向蒋介石，又听说有几位国民党的女同学向冯玉祥告了密。所以我们大家都惴惴不安，只好作最坏的准备。领队马骏给每人发了二十元银洋，还嘱咐我们，说如果冯玉祥翻了脸，查问谁是共产党员时，就有一人出来承认，准备坐牢，以便掩护其他党员同志。有一天，冯玉祥把我们集合起来，派一个姓葛的副官把我们押上火车。马骏问葛副官：“是把你们往武汉政府送吗？”他说：“长官交待我送你们到武汉，下了火车，就不管了，听你们自便。”我们到武汉那天，正好十月十日，就在前一天，当年春天与邓小平等一起回国的李宪仲同

志，便被武汉政府枪杀了。我们还在去武汉的火车上，就已经分了小组，指定了组长，一下火车就避进了租界，我和马骏分在一个小组。马骏出去与中央取联系，接头的人来到旅馆，竟是邓小平。为了安全起见，我们化整为零，分成几帮。我随马骏到了上海，经周恩来同志接见后，被分配到广州，因错过了接头日期，在同学黄甘霖家住了两个月，刚刚接上头的那天夜里，广州暴动发生了。暴动失败后，中央派来的交通把我们带到了香港，坐在人力车上，看见满街警察带着白袖箍，跨街的横幅上写着“宁可错杀一千，不叫一个共产党员漏网”的白字标语。我们未敢久留，很快又回到上海，接着被派到安徽。1928年1月28日，我在交通站被国民党逮捕了。被押解到安庆，经特种法庭判处二年半徒刑，直到1930年夏天保释出狱。1931年春党组织派我到东北去，从此便投身于白山黑水的抗日烽火之中，在那里工作了三年多。

回忆在莫斯科中山大学近两年的学习生活，确实受益非浅，它使我懂得了科学社会主义，认清了中国革命的前途和方向，坚定了实现共产主义的信念，为我一生的革命活动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附记：1985年春，政协文史科的同志去京拜访了黄秀珍同志，将她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的前前后后进行了录音，根据录音整理了文稿，然后又寄送黄老进行了修改和补充。

（诸城县政协文史科供稿）

对太河惨案的回忆

马 若

毛泽东同志在《团结一切抗日力量，反对反共顽固派》一文中提到国民党内部的顽固派在山东闹秦启荣打游击队的事。对此，毛选中有条注释说：“1939年4月国民党山东省主席沈鸿烈指使秦启荣匪部在博山袭击八路军团级干部以下四百余名”。这一事件就是“太河惨案”，袭击我军的是秦启荣匪部所属的王尚志、李笑文部。我亲身经历了这一事件。本文就是我对这一惨案的回忆。

1939年3月中旬，我在八路军山东纵队三支队十团四连担任文化干事（文化教员）时，连队指挥员张琳同志通知我，说上级决定调我到纵队鲁迅艺术学校学习。我听了非常高兴。大约在3月20日左右，我把我的一支土造马枪和一支意大利手枪交给了司务长，告别了战友，到团政治处取了介绍信，就到三支队政治部报到去了。

支队司政机关都住在焦家桥，是一个很大的镇子。我报到时，已有十几位同志先期到达，集中在那里。我们暂编为一个队，在一起学习、出操。早晨，在跑步前还练练发声。后来又来了四十多人，其中多数是去堤岸军政干校的，少数是去鲁艺的。临出发时，又从后勤部来了几十名小同志，他们是到纵队受医务训练，为连队培养卫生员的，最大的也不过十八九岁。还来了一些同志，听说是调动工作或去延安的。护送我们的是三支队十团的四连和七连。四连在前担任前卫，我们受训同志的武器都上交了，徒手走在中间，七连是后卫。

队伍出发后，经过卫固镇附近，准备从湖田和金岭镇两个火车站之间；穿过胶济铁路封锁线。由于被敌人发觉，当晚没有过去，又退回卫固镇附近。第二天黄昏，队伍集中到野外农田里，由支队政委霍士廉同志亲自作简短动员，并下达了今夜一定要通过封锁线的命令。他说，如果再过不了铁路，敌人发觉后，会加强铁路沿线的警戒，再过就更困难了。

队伍以急行军的速度出发了。到距铁路五里左右时，前面传来命令：“跑步前进！”一直跑到铁路，只听在铁路上担任警戒的同志小声喊：“快！”